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②

规范与实证的 政治学方法

郭正林 肖 滨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②

规范与实证的 政治学方法

郭正林 肖 滨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本书属于中山大学部（教育部）省（广东省）共建高水平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和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项目（编号：011-315241）——政治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

学术顾问：夏书章 王乐夫

编辑委员会成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 娟（美国） 郭巍青 郭小聪 郭正林
何包钢（澳大利亚） 何高潮 李连江（香港）
刘 恒 刘 星 刘小枫 马 骏 任剑涛
王绍光（香港） 王 欢（美国） 肖 滨 徐俊忠
徐忠明 张海清 郑永年（新加坡） 钟明华

总序

如果把编撰、出版这套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视为我们的一种学术志业选择,那么,激励我们进行这一选择的理由有三:

其一,接续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行政学在中山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1924年孙中山先生手创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时,即将1905年广东开办的法政学堂纳入其中,并设立政治学系,这一学科建制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才告中断。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大担任教职的不仅有著名政治学家萨孟武、邓初民和著名政治哲学家、宪法学家张君勱先生等人,而且有不少默默耕耘的政治学、行政学教授。在一份由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室提供的民国21年(1932年)至民国24年(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职员名录的资料上,我们就发现了一些政治学、行政学前辈的名字,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胪列其中几位:

——邓孝思,政治学系主任、教授,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政治学说、政治学史。

——詹显哲,政治学系教授,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兼政治经济科,主要从事国家学、国际政治、政治史的研究。

——刘永南,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毕业,主要从事各国政党论、地方自治的研究。

——邱昌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宪法、地方自治的研究,著有《议会制度》、《地方自治》等。

——范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主要从事宪法、行政

法的研究。

——梁贞，法国国立第戎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宪政学、行政学、民族运动史的研究。

——胡汉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地方自治、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梁朝威，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现代政治思潮的研究。

——蒋竹林，美国密歇根大学市政管理学硕士、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各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

以上只是从一份简略的档案资料上获取的信息。不过，由此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进行仔细的收集、发掘和整理，一定可以再现出一个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传统，那将是一个浸透了前辈学子心血的历史传统。可惜，这一传统因1952年全国的院系调整而随风飘散。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老一辈著名政治学与行政学家夏书章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在王乐夫教授的领导与努力之下，中山大学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才得以获得恢复、重建，并获得较大的发展。

在走向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先前学者努力的基础上，延续学科的历史传统，承接前辈学人的学术风范，是值得后生学子不断思考与实践的大问题。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可以视为我们对此问题交出的一份远远没有结束的答卷。

其二，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增长。

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对政治漫长的经验和长期的思索中，逐步形成了一门被称之为“政治学”的知识系统或者说一门科学：“在‘科学’一词的广义上，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掌握和组织的信息和理论是知识。这种知识既是真实的又是有用的。这种知识也

是积累而成的。”^①

正视或者面对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我们确实需要反对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古人对它无所不知，我们只能借助和吸取他们的智慧；第二，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惟一方法是摆脱过去的羁绊；第三，政治学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知识，它纯粹是本土经验积累的产物。这三种观点之所以不能接受在于：第一种观点封杀了政治科学知识增长和知识创新的必要性，意味着政治科学知识之树再也不结新果；第二种观点破坏了政治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连续性，其结果是政治科学知识之树的根被彻底挖断；第三种观点否定了政治科学知识跨国界交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使政治科学知识之果沦落为不能进行国际交流的“土特产”，从而最终失去知识的价值和品格。毫无疑问，对政治科学知识系统的发展而言，这三种局面都是灾难性的。

因此，如何借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活动和知识交流，建立起政治学科的国际标准和全球视野，同时，通过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推动政治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使政治科学这棵知识之树在中国的学术园林中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是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论丛的编撰、出版即是希望为此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其三，为中国政治趋向法治民主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政治学的支持。

一百多年前，目睹19世纪时代巨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不朽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中断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他确信，这将导致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面对这一变革，他提出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然而，托克维尔忧虑的是，“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

^① [美]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竺乾威等译，王沪宁校，《政治学手册》（上卷），第14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惊涛又把我们卷了进去，推回深渊。”在托克维尔看来，走出这种深渊，需要一种政治知识系统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呼吁：“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①

显然，如果把这一呼吁运用于当代中国，那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说引向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而全新的社会或者新的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不仅为我们奉献一种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而且为中国政治实现向法治民主的转型、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智慧资源和操作技术。确立这样一门政治科学无疑是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的学者们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可能需要许多代人持久而坚韧的努力。编撰、出版这一套政治学论丛正是我们做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虽然是极小的一步。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把本论丛的编撰、出版视为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定位为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因此，在整体布局上，本论丛将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论著系列。具体包括学术论文集、政治学评论和学术专著。二是教材系列。三是译著系列。在操作方式上，我们将采取渐次推进、积少成多的策略，以期通过长期的努力实现规模效益。

我们渴望同行专家的批评。

我们期待读者朋友的指正。

我们企盼得到大家的呵护与支持。

中山大学政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3年11月

^①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4、8、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目 录

前 言	郭正林 (1)
一、政治学的范式推演与路径多元	郭正林 (1)
二、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王绍光 (25)
三、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流派与方法	袁达毅 (57)
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体系与方法	陈红太 (70)
五、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	
——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	
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	任剑涛 (87)
六、作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西方古典政治	
思想考察	肖 俊 (118)
七、女性主义的政治学视角与方法	郭夏娟 (134)
八、政治科学的概念阐释与引入过程	肖 滨 (161)
九、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	王敬尧 (176)
十、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贡献、批评与	
前景	马 骏 (189)
十一、政策制定的方法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	
主义	郭巍青 (208)
十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拓展与方法创新	张小劲 (230)
十三、剧变时代的比较政治分析：方法与主题	
的变奏	张海清 (258)
十四、实证研究与中国政治学	张紧跟 (272)

十五、当前国内政治学经验研究方法的评价和

反思 肖唐镖 陈洪生 (284)

后 记 (304)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集体耕耘的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深感国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为促进政治学方法论的学术研究,大家走到一起来了。

回顾 20 年来国内政治学的发展,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术研究,都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看到,我国政治学研究早已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束缚,走出了单纯注解经典作家的狭窄范围,在思考、探索、回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赢得了应有的学科地位。然而,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注严重不足,知识陈旧、视野狭窄、方法单一。这种落后状况成了制约我国政治学发展的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不仅我国政治学学术水平同国际政治学的差距缩小不了,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要求。这本《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就是冀望对改进我国的政治学方法做一点绵薄的贡献。

政治学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尽管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和学术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然,中国不是西方政治学术语、概念和理论体系的销售市场,国内的学者也不能甘当这种被动的消费者,更不能食洋不化,拿洋玩意唬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闭关自守、闭门造车。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批判的眼光、中国发展的关怀和平等对话

的能力。这就需要认真改进我们的学风和研究方法。

作为学科化的政治学,在西方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有近百年的历史。百多年来,政治学在西方经过了三次大的理论突破和多种多样的范式竞争,其研究的具体途径、方法技术更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相比之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要正视自己的短处,才会有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内在动力。我们的理论要突破,方法要创新,就必须融入当代中国火热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去,再也不能翻翻本本、弄弄经典,就大发空论,这种脱离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实际的所谓学术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的放矢。我们还要冷静地审视当代国外政治学的动态,在参与和竞争中,促进我们的政治学发展。

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是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的范式转移。无论是理论视野、理论体系,还是研究的方式方法,都需要重新定位、寻求突破。毫无疑问,教条主义是无果的,跟着西方跑也没有出路。我们需要建立适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整套学术标准、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机制,减少学术资源的浪费,杜绝学术剽窃和抄袭,保障和促进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虽然这一目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但凡严谨的学者都应该一点一滴地去努力,去实践。

本书所辑篇章大致可分三大部分,一是政治学方法论。主要讨论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历史演变、基本路径以及方法体系,重点分析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式推演,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国内政治学的流派与方法特征,中国政府体系研究方法等。二是规范取向的政治学方法。主要分析了规范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资源与当代视野、理论拓展与方法创新,着重阐述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关联性,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学视野与方法等主题。三是实证及经验取向的政治学方法。主要

讨论了实证及经验研究的方法论特征、基本作用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前景。内容包括政治科学的概念建构,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方法,决策分析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方法,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及其评价,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拓展、主题变化与方法创新,实证研究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意义以及国内经验政治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趋势等等。应该指出的是,当代政治学已经发展到规范与实证、先验与经验相融合的综合范式阶段。因此,实证取向的政治学方法并不排斥规范方法的成分,例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模型就明显具有这样的特征。同样,规范取向的政治学方法也不排斥实证分析、经验研究的成分,例如女性主义、话语分析等等就是这样。因此,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下面,我们简要概述各章的主题和内容。

在“政治学的范式推演与路径多元”中,作者把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放在政治学百年史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这一考察立论于一定的理论范式需要同一定的研究方法、叙事方式与之相适应这个观点。作者通过引入“范式”概念,把西方政治学发展划分为三个范式阶段,即经典制度分析范式的政治学、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学和综合范式的政治学。而政治学的发展,就是理论范式的推演和研究路径的多元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学进入了综合范式的阶段,基本特征是政治学的各种范式在竞争中相互渗透和支持,并形成了研究路径的多元化取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也开始呈现这种发展态势。

王绍光在“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中的思考是冷峻而又富有建设性的。作者回答了政治学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和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论文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多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由西方人提出的。面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是不是要警惕学术上的“失语症”?作者严厉批评了那种惟西方之

是非为是非的崇洋心态,倡导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一切。当然,作者不是提倡怀疑主义,而是主张政治学方法论的自觉,以扬长避短的态度取舍中外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作者列举了许多例证,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把适合西方社会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框架,如果不加批判地套在中国政治研究的头上,就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如果政治学有本土化的要求,那么本土化必须从本土学者做起。政治学如何本土化?一是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要辨别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二是揭示西方理论背后的种种假设,思考它们、置疑它们、有所取舍;三是梳理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及其定义;四是切忌为方法而方法。

袁达毅提供的“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流派与方法”,以白描的手法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流派与方法。认为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可归纳为“机关派”、“学院派”和“田野派”。相应地,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考据法、解释法、论证法、实证分析法和“拿来法”五种。由此,作者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及其方法进行了展望,认为机关派和学院派正在走向合作,两者的差异逐步缩小;田野派的阵容和影响正在逐步扩大。而在研究内容上,中观和微观的问题将进一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分析方法及国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将会进一步引起学者的关注。

陈红太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体系与方法”中,比较系统地归纳了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理论及其方法。认为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取向,一是制度的、规范的和价值的研究取向;二是实证的、行为的和过程的研究方法。而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两者结合。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体系的分析框架,应该考虑四个因素:一是这个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或哲学思想;二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的理解或界定;三是研

究者自身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四是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或说研究对象的个性特征。这些观点对如何进行中国政府体制的具体研究很有启发。

“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讲。任剑涛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勾画了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的内在关联。作者回答了四个涉及当代政治学发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为什么会出现政治理论的复兴以及这种复兴对理解当代政治生活、政治哲学的重建有何意义;二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为什么主导西方政治学的学术方法是规范政治理论,随后其主流地位为什么会被行为主义政治学取代;三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凭什么能够颠覆传统规范政治理论而取得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为什么会被晚近复兴的政治哲学所动摇;四是当代政治学为什么在方法论上主张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并举的取向,由此促进了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综合趋势。作者强调,自由天性是不可侵犯的。这是任何政治理论不管以什么样的治学方法、什么样的政治学陈述来进行政治理论建构,都必须坚守的原则。而综合范式的政治学之所以强调规范与实证方法的并举与互补,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即政治就是受一定价值所支配的政治行为过程,这些价值有如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和秩序等等。

作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有如文化人类学所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社会学所主张的“主位研究法”等等。对作为方法论意义的相对主义进行哲学论证,也就显得十分必要。肖俊在“作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中,认为在现代这样一个多元化、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相对主义对于人类的道德判断和社会选择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尽管相对主义一直未能在方法论上获得主流地位。然而,作者通过考察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发现相对主义秉承古希腊认识论上的怀疑精神,挑战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权威,发

挥了除魅解蔽的作用。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既可能促进知识的增长,也可以打破那些固化在人们头脑中的条条框框。政治思想的繁荣,离不开相对主义对解放思想的贡献。

对当代政治学研究来说,女性主义的视野和方法是不能忽视的了。郭夏娟在“女性主义政治学的视角与方法”中,分析了“后现代”阵营里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方法取向,即经验方法、立场方法和后现代方法。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中,她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都是男权统治的、父系制的、充满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的社会。因此,女性主义具有天然的革命冲力和批判精神,张扬“个人即政治”的主张,把“政治”从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等所谓“公共领域”引入到了家庭、两性交往等所谓“私人领域”,从而突破了公私两大领域的传统界限。女性主义政治学家用细腻的、经验的、观察的事实与事件来控诉整个男权统治的矫情、虚伪和霸道。在政策行动上,“妇女解放”变成了“解构传统权力话语”,“打倒夫权”变成了抵制整个男权统治。这样一来,女性主义的政治学视角与方法,就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性生活与社会制度、微观行为与宏观政治紧扣在一起了。

肖滨在“政治科学的概念阐释与引入过程”中,丝丝入扣地分析了当代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如何在“抽象概念”与“经验观察”之间架起经验研究的逻辑桥梁。这种“心脏搭桥手术”的重要意义,一是勾联了政治价值同政治行为过程;二是勾联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为此,作者提供了这种“心脏搭桥手术”的实施方案,即以分析与限定所引入的概念为起点,以借助经验观察、操作定义、纳入理论系统为途径,使概念扩展为可以经验研究的变量及指标。因此,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引入问题的解决,就是包括起点、途径和扩展三个环节在内的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的连续过程。

个案研究是实证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王敬尧结合其对村民自治的丰富研究经验,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中把个案方法分成个案学理型研究和个案对策型研究两大类,认为这两种个案方法在研究的理念、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选择、研究的条件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和不同的要求。在方法论上区分和把握两类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征和目的要求,对指导我们进行个案研究有帮助。

理性选择是当代政治学研究中的基本途径之一。马骏提供的“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从理论发展与研究领域的视野,阐述了理性选择模型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以及相关的学术批评。作者把那些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政治模型都视为理性选择的分析路径,认为理性选择路径是政治学研究内部出现的“经济学转向”的结果。理性选择路径使得政治学研究从原有的基本问题发生了重大转移,即从以“分配问题”为研究主题的传统政治学转变到以“约束-动机问题”为研究焦点的现代政治学。在方法论上,理性选择模型坚守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继承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模式,强调解释模型的建构,要求理论假设的可经验验证性质,并强调经验数据来源的客观性、可靠性。尽管理性选择模型遭到了诸如格林、沙皮罗等人的学术批评,但理性选择模型在不断完善其理论假设和解释模型的基础上提高了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解释能力。

政策分析得以确立有赖于研究方法的革新。郭巍青在“政策制定方法论”中揭示了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再到“新理性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这一发展过程的内涵,就是从全整理性模型的科学浪漫主义,发展到西蒙有限理性模型的次优策略及林德布罗姆的渐进主义;从基于时机的“垃圾箱”模型的反理性主义,发展到效果导向的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模型。这种循证决策所体现的新理性主义,

不仅强调政策分析的效度原则,而且要求决策信息化、民主化和知识化。

张小劲提供的论文,主要阐述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拓展和方法创新。作者认为,近十多年来,比较政治学针对研究方法、取向与领域、主题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对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渗透;二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自经济学的新发展中主动吸纳或吸取而形成的创新发展。作者通过具体考察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勾勒了比较政治学领域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学科建设的意义。

张海清在“剧变时代的比较政治分析”中,放眼于当今世界格局分化重组的剧变,阐述了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和主题的变化及趋势。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不同国家、民族、族群、种族、文明或文化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不仅反映了“三个世界”在经济及国际分工上的不平等,而且也是制度的隔阂。而分析比较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就成了比较政治学的看家本领。显然,解释政治制度的变量不应该是它自身,于是人们从经济的、社会的、阶级的、历史或文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国际分工或依附关系的等不同角度来解释各国政治制度的异同及其影响,于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路径,比如新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全球公民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文明冲突论、比较制度主义、全球民主化(所谓第三波)、欠发展与依附论等等。作者认为,时代赋予比较政治学的使命之一,就是通过比较研究而求同存异,增进国际间的沟通、认知、宽容、理解与合作。由此,突显了比较政治学研究视野的独特性质。

张紧跟在“实证研究与中国政治学”中,阐述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同等重要性。作者通过分析国内政治学研究中重注释轻现实、重宏观轻微观、重定性轻定量、重思辨轻实证的局限

性,提出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实证研究,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比较成熟的实证研究方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使我国的政治学在规范和实证“两个轮子”的推动下稳健发展。

肖唐镖和陈洪生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经验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一般水平。分析表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抽象、空洞、本本主义的问题明显。作者发现,国内政治学者大多不满于这种现状,却很少有人自觉地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运用与使用情况进行仔细、专门而系统的分析,即使偶尔有一些方法论的文章,也停留在大而化之的议论而不是严谨的学术评价的层面上。通过对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正式发表的政治学论文的文本分析,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规范研究偏重而经验研究不足;研究的不规范性现象严重;方法陈旧单一。作者倡导:要实现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首先就应大胆地借鉴、运用和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对经验研究方法的应用。

总之,如果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不能有突破性的进展,政治学研究就难以开拓新局面,就难以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要求。不合格的方法,生产不出合格的知识。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学,我们应当寻求政治学理论的突破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一、政治学的范式推演 与路径多元

郭正林

政治学由理论范式、研究途径和方法技术三个层次所构成。政治学方法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政治学的不同理论范式是如何采取适当的研究途径和技术的。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政治学科在 1880 年才成为大学的专业之一。由此而来，政治学的理论范式经历了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理论范式的发展变化，政治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技术的推陈出新，形成了路径分殊、方法多元的研究格局。

本文试图勾勒 20 世纪政治学的范式推演过程及其研究路径的拓展。

（一）政治学的范式推演

1880 年，伯吉斯（John W. Burger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研究生院，这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开端（王沪宁，1987，页 301）。由此开启了政治学理论范式的百年推演。这一演进的历程，就是从经典制度主义到行为主义，再从行为主义到规范与实证并举的综合范式政治学的过程。

所谓研究的“范式”（paradigms），就是一套自圆其说的概念体系或解释的逻辑体系。在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那

里,日心说取代地心说是科学革命的结构转换,这种转换就是科学理论的范式更替。艾尔·巴比(Earl Babbie)指出:“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相同。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至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巴比,2000,页57)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见到的更多是范式的竞争而非替代,范式竞争的展开就是范式的推演过程。事实上,一个新的范式可以吸引一些追随者,或者说从原来的范式中分流一部分人员,但不可能把所有的研究者都从旧范式中牵引出来。

1. 制度分析的经典范式

为什么制度主义成为政治学的经典范式?爱克斯坦(H. Eckstein)从学科独立发展的内在需求加以回答。他说:“政治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就要使自己区分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社会学,于是就要强调对正式法律制度的研究。”(Eckstein, 1963, pp.10—11)。也就是说,制度分析范式的确立,使政治学得以摆脱哲学(或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的纠缠,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伯吉斯等人十分强调科学主义的取向,因为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把“科学主义”揽入怀中是学科获得学术声望和尊重的必要姿态。同时,伯吉斯圈划了政治学研究的三大范畴,即政治共同体、宪法和公法。这样也就建构了学科化政治学的第一个理论范式。

应该看到,在制度分析范式建立以前,支配政治学研究的是规范的政治理论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是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霍布斯、洛克、马克思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长驱直入的领域。当今的政治学说史家把这些经典大师归入政治学家的行列,显然比较牵强。因为政治思想或者政治学说不过是他们宏大哲学思想体系组成部分,如果不把这些政治理论放在他们的整个

思想体系中来考察,就不能恰如其分地诠释他们的政治观点。因此,政治学从其创立时期开始,就存在一种来自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要求以科学主义来与强大的传统规范理论相抗衡。所谓规范政治理论的霸权遭遇了科学的“阻击”,是因为这种规范政治理论还没有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客观基础(任剑涛,2002)。然而,规范理论的这种霸权地位并不是“刚刚建立”,而是垄断了以往的政治思想史。

经典制度主义或传统制度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学的范式之一,是因为满足了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它有明确的研究主题或问题领域,这个主题就是正式的法律制度框架,包括宪法、公法、正式制度结构等。二是它有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体系,其方法论特征是历史的、比较的、文本的、描述的、归纳的逻辑与方法。三是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流派,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来临之前,政治学研究者们所信奉的主要是这种制度分析范式的政治学,即使20世纪30年代以后,仍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这一范式并加以理论改进。

在方法论上,制度分析的经典范式有三个基本取向:

第一,描述与归纳逻辑的取向。这种取向就是通过对过去所发生的现象及其相关事件的系统描述和分析,来解释当前的政治事物。这种研究的取向十分强调解释和理解法律制度,而不是制定法律。它注重历史事实和自然建构,认为政治制度的形成就像珊瑚礁那样,并不是大家在共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出来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慢慢堆积起来的。因此,认识过去,就是把握现在和将来。而所谓归纳,就是通过对不断重复的历史观察而得到的可靠政治知识。

第二,正式法律制度的取向。这种取向把公法与正式政府组织作为研究的主题。由于宪法是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体系,因而制度分析特别注重对宪法制度或民主宪政框架的研究,并把这种

研究放在历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

第三,历史与比较的取向。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论辩到:“只有了解了其他的政府制度,只有通过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形成一个类型的观念,才能理解和评价我们自己的制度。”(Wilson, 1899)欧洲的政治学传统关注国家理论的研究,这种学术传统支配了制度比较分析。一般来说,他们关注合法权力的垄断形式,即国家本质,同时考察国家制度的运行方式。而从制度比较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就是一些工具,国家组织与公民社会的权力关系是通过制度来建构的(Finer, 1932)。

由此可见,制度分析的经典范式体现了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即通过判断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来揭示自由民主的价值。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为什么制度分析范式让位于行为主义政治学了呢?其一,制度主义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不能很好地解释政策的形成和权力的运行过程;其二,制度主义过分强调正式法律制度及其历史背景,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对决策与权力行使的影响;其三,制度主义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是描述导向的而不是问题分析导向的静态政治学。于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取代了制度分析范式而变成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制度主义又收复了传统制度分析范式所丢失的许多地盘。

2. 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学

行为主义并不是政治学本身发展出来的研究范式,而是把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并以个体的政治心理、行为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政治学新范式。可以说,这种范式是科学主义进一步渗透政治学的结果。

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是具体而广泛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把民主制度环境下的大众政治参与的动机、原因作为分析的

焦点。例如1957年唐斯的选举研究提出了一个“选举的悖论”:选举是一种集体行动,当一个人的选票不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时候,为什么选民还要去投票?(Downs, 1957)像游行示威、罢工甚至骚乱等集体政治行为,也存在类似的悖论等待政治学家解答。行为主义范式不仅被精英主义理论用来分析政治领导人的行为风格,同时也被集团理论用来分析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取向,甚至被用于国际政治行为的分析,如国际关系中的政府行为、跨国公司、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等。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大家族中,从政治人的微观心理结构,到跨国政治组织(如欧盟)的宏观组织行为,都被纳入其研究的范围或视线。而行为主义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人或者集团为什么要那样行动?而行为主义者很自信地认为,他们能够提供最有力的分析框架。

行为主义范式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鼎盛时期是60—70年代,出版了一大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典著作。然而,行为主义范式的思想来源要追溯到19世纪的孔德哲学(Auguste Comte)。行为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著称的逻辑实证主义。这种逻辑实证主义把命题分成三种类型:一是不证自明的,如“人必有一死”;二是可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例如“投票者A是A政党的信徒”;三是无意义的命题(或伪命题),那些既非不证自明又不能经验验证的命题,例如,“A政党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因为“所有人”是经验观察不了的。

不能说行为主义范式完全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但逻辑实证主义对“意义的命题”的界定,深刻影响着行为主义范式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特征,一是强调命题的可检验性;二是强调经验观察的可靠性,三是强调观察的可重复性。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把对个体与集体行为的经验观察作为验证一个判断是否真实可靠的依据。

卡尔·波普 (Karl Popper) 的证伪主义理论把行为主义的问题置换成“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由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就把那些没有经过证伪或者不能证伪的命题以及命题的组合(所谓理论)统统排斥在“科学的”领域。例如,“上帝是全能”就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因此“上帝”及其领域(所谓神学)不是科学研究的领域。然而,另一个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 (Lakatos) 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命题都必须具有证伪性才可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核心观点或理论前提是不可证伪的,而这不意味着包含着这些核心观点的理论是不可证伪的 (Lakatos, 1974, pp. 132-5)。例如,把直选选举解释为民主观念的现实形式,那么,就直选选举所形成的经验理论是可以证伪的,但抽象的民主观念是不接受这种证伪的。因为,民主观念是由政治哲学来赋予其核心内涵,选举行为的观察只是对民主程度的一种量度。

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可以归纳为如下研究模式:

提出 Q (问题) → H (假设) → O (观察) → T (检验) → F (理论发现)

上述研究模式或路径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对于诉求于经验观察的行为主义来说,进入课题研究的问题必须是可以在经验世界中进行观察的问题。而理论假设就是可在经验观察中得到证伪或证实的命题。命题的真实可靠性(所谓信度和效度问题)是由田野观察、访谈、抽样问卷等调查研究的客观性来保证的。而在调查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资料等等,就是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的基本依据。同时,为了保证资料收集过程的客观性,行为主义研究范式还要求价值祛除,由此控制调查研究人员的主观取舍对数据资料真实性的干扰。

这套看上去富有科学美的研究范式,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达到其鼎盛时期。结果,似乎只有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学才是惟

一科学的政治学,其他都不配“科学”的称号。然而,这种自负的地位使得行为主义范式变得狭隘起来,开始排斥其他途径特别是规范的政治学研究。由于断然把那些不可量度的问题拒斥在外,并拘泥于微观的、细节的领域而不能自拔,经验导向的政治学家逐渐远离了行为主义范式政治学本来的学术旨趣(如解释集体政治行为的微观动机及其价值取向),变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智力游戏。尽管这种智力游戏对训练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帮助,然而,极端的经验主义取向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失去了对宏观政治变局的洞察及判断能力。香港学者郑宇硕指出:“九十年代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行为主义’时代的告终之时。”(郑宇硕、罗金义, 1997, vii)。行为主义范式走向低迷的现实原因,就是它既难以提供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及公共价值的得当解释,也没有提供解决现实社会价值冲突的睿智,更没能预见类似苏联东欧集团的政治大变局。因此,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学不再那么吸引人了,不得不让位于综合范式的政治学。

3. 综合范式的政治学

英国政治学家桑德斯 (David Sanders) 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遗产是如此的丰厚,以至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是后行为主义者 (Sanders, 1995)。其实,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来概括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并不贴切。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范式仍然是经验检验的逻辑,只不过这种范式放弃了传统行为主义的一些苛刻限制,即在不损害观察客观性及可靠性的前提下,不再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同时,行为主义政治学不得不承认政治价值研究的意义,承认洞察、思辨、推断等命题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学不再武断地把以规范范式为特征政治哲学排挤在政治学的体系之外。

我们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 (Kooiman, 1993, p. 35), 既导致了治理理论

(Governance theory) 的出现,也是政治哲学复兴、制度主义重来的社会原因,由此,行为主义范式的霸权地位得以推翻,迎来的是多范式并行竞争、相互渗透的新格局。笔者把这种多范式并存互动的格局称之为综合范式的政治学。

对政治行为与政治价值的交融性及其深度解释的要求,是导致政治学走向范式综合的动力。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什么是政治”。毫无疑问,政治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即使女性主义所坚持的“个人即政治”,也是就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而言的),而是由诸多个体通过一定的方式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无论我们从个人理性选择的角度,还是从结构性制度分析的视野,现实政治生活总是价值取向与行为过程的协奏曲。价值与行为的关联,犹如意义与生活的切合,政治的价值贯彻于政治行为;政治行为过程体现出政治价值取向。传统的制度范式以及行为主义范式,不是不关心公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在经验主义支配下企图把价值、意义还原成个人的经验和心理结构。这种把集体的、公共的价值及意义还原成个人的心理动机或理性取舍,是还原主义或化约论的基本特征,屏蔽了理论范式的综合视线。

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家,在他们受到科学主义“阻击”之前,他们那轻盈的思辨不但赋予政治思维的乐趣,而且从对政治历史生活的理论关照中挖掘出了公共价值或政治应当。当然,政治观念、理论、抽象只有在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才能如鲲鹏鸟瞰大地一样把握人间社会的经经脉脉。然而,这种抽象一旦游离于现实社会及人类历史,就会陷入妄想。

科学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期的以制度范式及行为主义范式为特征的政治科学,是对传统规范政治学的反叛。正如前面揭示的那样,没有这种反叛,政治学就不能在科学主义的时代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而就方法论来看,现代政治学特别是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

学,他们要求给规范的政治学研究带上经验逻辑的镣铐。这一目标是以确立事实、数据、证据的优先地位来实现的。在科学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以规范研究为特征的传统政治哲学,要么接受制度范式及后续的行为范式的理论改造,要么逃遁与逍遥。结果,不屈的政治哲学被放逐了。这种被边缘化的状况直到罗尔斯正义论的强势出台才得以扭转。

综合范式并不是各种范式的拼盘,而是各范式的竞争与相互渗透。这就要求各种范式摒弃门户相轻、派别成见,以人文关怀为终极、以现实问题为切入来提高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运用能力。邹谠在分析20世纪中国政治时,提出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的方法论主张,认为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分析与评判,要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邹谠,1994),这是方法论上的“两手抓”。这样的“两手抓”,要求把宏观结构及历史逻辑同个人选择、实际行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毫无疑问,单纯的历史分析,规范研究,往往于事无补。而单纯的个人选择分析、经验观察又是缺乏睿智和方向感的,结果无的放矢。

“必须脚踏两条船”,把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任剑涛,2002)。那么如何结合呢?肖滨认为,政治科学中概念,不进行操作定义就不能进行经验观察;而操作定义的前提,就是必须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理论阐释和语言澄清(肖滨,2002)。毫无疑问,理论阐释和语言澄清本身就是规范性的研究,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目的是进行意义分析和界定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二) 政治学研究的路径多元

当代政治学的范式综合,反映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相互支持和贯通的方法论整合趋势。范式的综合趋势,并不意味着各自研究路径的趋同或相互替代。每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有其最适合

的研究主题。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要求,选择适合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这是研究设计的基本任务。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竞争,表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主题有适合于它的范式、途径和方法。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任务,就是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主题来匹配恰当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技术。

政治学研究路径是指导人们进行政治研究的不同方式(Marsh & Stoker, 1995, p.8)。研究路径所包含的内容,一是问题建构或界定研究的主题;二是明确证据或分析材料的来源渠道;三是提供概念和命题的理论支持;四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性质和发展提出解释性及预测性的假设。

国内学者对研究路径的界定,体现了政治学方法论的自觉。王沪宁认为,研究途径就是用来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结构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程序,把研究对象的各项概念或变量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中(王沪宁,1988,页320)。陈振明对“路径”的界定简明扼要,认为研究路径就是研究问题的角度、焦点和模式,并称之为“元理论”(陈振明,1999,页85)。杨光斌也认为,研究途径是研究政治现象所选择的角度,研究途径一旦确定,与这个角度相关的方法就会被设计出来。

研究的路径总是同一定范式联系在一起的。某种研究范式一般包含多种研究路径,并构成一定的路径结构。而某个具体的研究路径必须获得一定理论范式的支持才能展开研究。在政治学发展的不同范式阶段,研究的具体目的不同,主题各异,因而研究路径的结构也不相同。

一般来说,制度范式的政治学研究,其研究主题和路径有国家理论、公法与宪法、制度结构与功能、制度历史等。与此相匹配的方法技术,主要有历史分析、法律分析、文本分析、定性分析以及规范分析等。由此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可以说

也是国家理论的一种。当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包括历史主义、法律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阶级分析等理论与方法。

对于行为主义范式的政治学来说,研究的路径主要有政治人格论、精英理论、集团理论、系统理论、博弈论、决策理论等。行为主义政治学以研究技术的精确化和经验验证为特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调查研究、问卷统计、定量分析、模型理论等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行为主义并不排斥定性分析,而是把它作为定量分析的概念基础。因为纯粹的定量分析并不能解释政治生活的意义。

对于综合范式的当代政治学而言,研究的范式多种多样,在此不可能一一罗列。相对来说,作为研究路径的规范方法、制度研究、行为分析、理性选择、女权主义、话语理论特别值得关注。这些研究路径当中,有的是原有研究路径的拓展和改进,如规范理论、制度研究、行为分析;有的是整合原有研究路径的结果,例如理性选择;有的是新开辟的研究角度、视野与方法,如女性主义、话语分析等等。而且,这些研究路径相互竞争,相互渗透,体现了当代政治学方法论的多元化特征。

表1是笔者对政治学范式、路径与方法的一种归纳:

表1 政治学的范式、路径与方法

范 式	路 径	方 法
经典制度 范式	国家理论、公法与宪法、制度结构与功能、制度历史等	历史分析、法律分析、文本分析、定性分析、规范分析